

江西通史

7

元代卷

吴小红◎著

钟起煌 主编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主 编 钟起煌

顾问 周銮书

副主编 邵 鸿

彭适凡(常务)

方志远

江西通史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西通史·元代卷/吴小红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11

(江西通史/钟起煌主编)

ISBN 978-7-210-03928-0

I. 江… II. 吴… III. 江西省—地方史—元代
IV. K2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3120 号

江西通史·元代卷

吴小红 著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1.5 插页:4

字数:360千 印数:1-3200册

ISBN 978-7-210-03928-0 定价:50.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E-mail:jxp-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主 任 钟起煌

副主任 钟健华 傅伯言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志远 孙家骅 邵 鸿 林学勤 彭适凡

编委会办公室

主 任 孙家骅

副主任 游道勤

工作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琴红 王紫林 曾 敏

常务编辑

林学勤 徐建国 游道勤

《江西通史》编辑委员会

江西通史

元代卷

吴小红
著



青花松竹梅纹梅瓶
凌氏红釉楼阁式谷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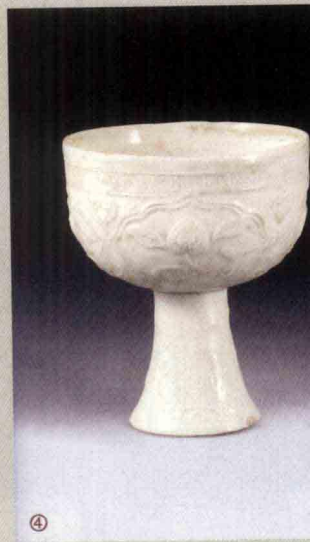
①



②



③



④



- ① 洪都何德正造至顺辛未铭铜镜
- ② 卵白釉印花龙纹盘（景德镇造）
- ③ 红釉老年文吏俑
- ④ 青白釉印花荔枝纹高足杯（高安出土）
- ⑤ 凌氏青白釉四灵塔纽盖罐
- ⑥ 青花釉里红盖罐（景德镇造，河北保定出土）
- ⑦ 青花蕉叶纹觚（高安出土）
- ⑧ 蓝釉白龙纹梅瓶（扬州市博物馆藏）
- ⑨ 青花缠枝牡丹如意云肩纹梅瓶（景德镇造，高安出土）

也或涵之其極也或
 板之其沸也或急之
 金石之聲也或擊
 之鳴人之聲也二然

大凡物不得其鳴
 草木之聲風繞
 之鳴水之聲
 風之鳴之鳴其聲

临川饶介《送孟东野序》



永和窑褐彩海涛纹连座炉



釉里红开光花鸟纹罐（景德镇造，高安出土）

总序

钟起煌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由机缘而起因执著而成,包括我们这部《江西通史》。

说由机缘而起,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几乎纯属偶然。2002年夏天,我和彭适凡、孙家骅同志谈到江西悠久的历史、谈到江西辉煌的文化,因而产生了组织专家编撰《江西通史》的设想,彭、孙二位当即认为此举当行而且可行。

说因执著而成,是因为一旦有这个想法,而且认为这是一件研究江西历史、弘扬江西文化的重要工程,就决心去做。为此,我征询了周銮书同志的意见,并邀请邵鸿和方志远同志共商此事,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2002年10月18日,在江西省文物局和江西师大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共同举办的全省文博教育成果展示与经验交流会上,我向大会通报了编撰《江西通史》的意见,引起全体代表的热烈反响,大家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表示支持,认为这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挖掘和整理江西传统文化、推进江西经济文化建设的一大盛事。有了这个共识,12月13日,准备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在我的主持下,召开了有关专家和编辑人员的联席会议,对编撰《江西通史》的指导思想、作者人选、工作日程、成果形式等具体问题展开了比较细致的讨论。2003年2月15日,召开了第一次编撰工作会,《江西通史》的编撰工作就此正式启动。

虽然说是机缘和偶然,但新的《江西通史》的编撰,实具备诸多因素和条件。

一、江西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在江西这块土地上,人类的活动至少已有20万年历史,它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和古代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末五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遂为

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其物产之富、人才之众,举世瞩目;进入20世纪,江西又因为中央苏区的建立而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很难想象,在十分漫长的时段里,没有江西的中国历史将会是什么样子。

二、文献与实物资料丰富。江西既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唐王勃语),又素称“文章节义”之邦(宋司马光语)和“人文之薮”(清乾隆帝语),存世官修私撰文献极为丰富。近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既可弥补文字记载之不足,更可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为编撰《江西通史》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证材料和科学依据。

三、前期成果丰硕、学术队伍整齐。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仍然健在,他们不但学术积累深厚,而且对研究江西历史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中青年学者正趋成熟,他们继承了前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又吸收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思维敏捷,勇于创新。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年来已有大批高质量的有关江西历史的学术成果问世,这些成果涉及江西历史的方方面面,为编撰《江西通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四、政治环境宽松、经济形势发展。盛世修志是中国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江西经济和全国一样,有较快速度的发展。这为编撰《江西通史》提供了自由的学术气氛和比较充裕的财力保证。近年来,江西的学术事业和出版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连续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给江西文化艺术界和学术界以振奋,也引起了各兄弟省市的关注。这些成就的取得,为我们组织大规模著作的编撰工作提供了经验。而周边各省如湖北、湖南、浙江以及其他省市新编通史的纷纷问世,对《江西通史》的编撰是有力的推动,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从我个人来说,当时也恰恰能分出一些精力和时间来抓这件事情。于是尽力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为作者们、编者们排除各种障碍,以保证这项重大工程的圆满完成。

四年来,《江西通史》的编撰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黄智权、吴新雄省长亲自过问此事并指示有关部门给予支持,省政协将其作为一件大的文化事业进行推动,省社联将其列为重大科研项目,江西师大、南昌大学、省社科院、省文物局、省博物馆和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也对参与编撰的专家们给予各种便利,出版部门派出了强大的编辑班子并准备了足够的启动和出版资金。特别要指出的是,各位作者在繁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能够将《江西通史》的

写作列入重要的工作计划并全身心地投入。我在第一次全体编撰会议上指出,《江西通史》的编撰是一项挖掘和弘扬江西历史文化传统的千秋事业,希望作者和编者将其视为自己学术生涯中的重大事业。事实证明,作者和编者们后来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正是因为有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全体编撰人员的共同努力,11卷的《江西通史》才能顺利地完成书稿并得到如期出版。

明代中期,随着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修撰地方志成为一大文化现象。各省、各府乃至各县的省志、府志、县志大量涌现。此后遂为传统。盛世修志也不仅仅限于修前朝历史,更大量、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乃是修当地地方史。具有全局意义的江西省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自明中期以来,江西整体史著作已编撰过多部,其中著名的有:林庭槐《江西通志》(37卷,明嘉靖四年),王宗沐《江西省大志》(8卷,嘉靖三十五年;万历二十五年陆万垓增修),于成龙、杜果《江西通志》(54卷,清康熙二十二年),白潢、查慎行《西江志》(206卷,康熙五十九年),高其倬、谢旻《江西通志》(163卷,雍正十年),刘坤一、刘绎、赵之谦《江西通志》(180卷,光绪七年),吴宗慈、辛际周、周性初《江西通志稿》(9编,民国三十八年)。20世纪末,又有许怀林的《江西史稿》(1994年,江西高校出版社),陈文华、陈荣华主编的《江西通史》(199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问世。这些著作在保留江西历史遗存、挖掘江西历史文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何在充分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是对新编《江西通史》的重大考验。

为了使新的《江西通史》更具有时代特色和历史价值,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对这部著作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一、中国历史是一个整体,我们在研究任何地方历史的时候,都不能脱离这个整体。因此,正确认识各个历史时期江西在全国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必须充分关注江西与中央、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不溢美、不自卑,不关起门来论江西,将《江西通史》写成一部与中华民族的整体有着血肉联系的江西历史。

二、《江西通史》是系统记述和研究江西历史的大型学术著作,由众多学者共同参与完成。一方面,各卷是作者的个人成果,是作者最新研究成果的结晶,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所以希望作者精益求精,使其成为各自领域的学术精品。另一方面,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又必须是一个整体,是一部“通史”,所以全书11卷必须有统一的体例和统一的要求,在文风上一定要力求简

洁、明快。各卷作者务必服从整体、服从大局,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整个《江西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江西通史》必须是一部真实、动态、有可读性的信史。所谓真实,是指史料翔实、言必有据。此“据”是经过考证后认为合理的,否则,“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语)。这就需要每个作者既尽可能地系统爬梳和挖掘史料,又谨慎辨析和使用史料。所谓动态,是指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既将问题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又特别关注它的演进过程,因为即使是同一件事物,其状态和作用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这就需要每个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阐释历史、去探讨历史演进的规律。所谓有可读性,是指应该用流畅的文字、叙述的方法写作,展示的是作者的观点和结论,而不是考辨的过程,它的体例是史书而不是论文。无图不成书。图文并茂是中国出版物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特点,《江西通史》应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收集能够说明江西历史各阶段各方面状况的历史图片,以加强其历史感和可信度,同时也使其更具有可读性。

四、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基层社会为本。所谓以人为本,指的是要写成人的历史,以人的活动为描述对象,即使是制度、习俗,也应尽可能地有人的活动。所谓以民为本,指的是尽可能地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来叙述历史、看待历史,更多地叙述大众的活动。所谓以基层为本,是因为地方史本身就是基层乃至底层的历史,要尽可能地揭示基层组织和底层社会的活动状况。在此基础上,充分重视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对社会的主导作用,重视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特别是包括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实政治制度等在内的上层建筑对个人、对大众、对底层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写成一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互动、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互动、社会精英与人民大众互动的历史。

11卷本《江西通史》即将付梓,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够成为江西历史研究的新的里程碑、能够成为江西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当然,能否达到这个目标,还要由读者和历史来检验。

前言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游牧民族肇建而实现一统的王朝。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蒙古部首领铁木真兼并漠北草原各部后,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称帝建国,尊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随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开始了一系列征服战争: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1276年占领南宋都城临安(治今浙江省杭州市),1279年在广州新会以南的崖山将南宋行朝彻底倾覆,并远征海外;与此同时,连续三次远征西域,使大蒙古国军队马蹄和声威西至地中海东岸,东达朝鲜半岛,南及越南、爪哇,北包西伯利亚。1271年(南宋咸淳七年),成吉思汗孙忽必烈(元世祖)采纳汉人文臣刘秉忠等人的建议,以大蒙古国疆域之广,超越前古,乃取《易经》“乾元”之意,以“元”为国号,谓“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①。从此,汉文文书只使用“元”或“大元”作为国号,蒙古文书仍袭用“大蒙古国”之名,二者所指范围一致,即包括大汗统治地域(元朝政府直接管辖的地域)和西北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4个由成吉思汗子孙建立的宗藩国^②。故,元朝历史从成吉思汗建国开始,到明军进入大都、元顺帝退出中原为止,前后163年(1206—1368年)。历14帝。

① 苏天爵:《元文类》卷四十《经世大典序录·帝号》,国学基本丛书本。

② 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兼论蒙元国号的演变》,原刊于《汉学研究》第三卷第一期(1985年6月),第23—40页;又收于萧著《蒙元史新研》,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3—46页。

元朝历史大体可分为4个时期：一是前四汗时期，历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四朝（1206—1259年）；二是元前期，即忽必烈时期（1260—1294年）；三是元代中期，历成宗铁穆耳、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英宗硕德八剌、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天顺帝阿速吉八、明宗和世㻋、文宗图帖睦尔和宁宗懿璘质班9帝（1295—1332年）；四是元代末期，指顺帝妥欢贴睦尔统治时期（1333—1368年）。

元人说，本朝直接管辖的地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①，被划分为12个一级行政区，即中书省直辖区（又称腹里）、10个行省和中央宣政院直辖的吐蕃地区。十行省是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辽阳行省、岭北行省、云南行省、河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和湖广行省^②。其中，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因位于长江中下游以南，又有许多相似性，元代文献称之为“江南”，研究者则习惯并称为“江南三行省”。

江西行省地处江南三行省中部，境域狭长，跨越南岭南北，包括今江西省大部 and 广东省大部，今天的江西省在元代则分属江浙和江西两行省。具体说来，今南昌市、九江市、宜春市、新余市、萍乡市、吉安市、抚州市和赣州市隶属江西行省，上饶市、景德镇市和鹰潭市归江浙行省管辖。本卷所讨论的地理范围指今日之江西省。为示今日“江西省”与元代“江西行省”（全称是“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元人有时亦简称为“江西省”）之区别，本卷行文时，以“江西”或“江西地区”指代今日之江西省，元代的江西行省则径直称为“江西行省”。

江西地区与蒙古人的接触始于1259年（南宋开庆元年）宪宗蒙哥时期的征宋战争。当时，仅西部的临江军（治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和瑞州（治今江西省高安市）短暂地受到蒙古军队的攻击，其余州郡未被扰动。就在这年，奉命南征的忽必烈派人与贵溪龙虎山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接触，揭开了江西道教在元代的贵盛之幕。

至元十一年（1274年，南宋咸淳十年）九月，元朝开始大举攻宋。次年正月，江西进入元军的视野。经过两年战争，到至元十三年（1276年）岁末，元军基本占领江西地区，江西由此进入长达八十余年的蒙元统治时期。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在河南行省颍州（治今安徽省

①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② 以上内容并请参阅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朝代·元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252页。

阜阳市)颍上县宣布起事,揭开了元末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事大幕。八月,河南行省黄州路(治今湖北省黄冈市)麻城铁工邹普胜、罗田布贩徐寿辉等起兵于蕲州(治今湖北省蕲春县)。十月,徐寿辉称帝,国号“天完”。十二年(1352年)初,天完军队进入江西,江西民众蜂起响应。经过元军与天完军队的反复争夺,至正十九年(1359年),江西地区尽归天完政权,元朝在江西的统治彻底瓦解。次年闰五月初一,天完部将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大汉”,江西遂为汉政权所有(袁州除外)。至正二十年(1360年)六月,朱元璋攻下信州(治今江西省上饶市),势力进入江西。二十四年(1364年)二月,朱元璋消灭汉政权,次年正月,赣州降,江西基本处于朱元璋的控制之下(名义上隶属以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的宋政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江西进入明朝统治时期。

本卷所讨论的时间范围起自1259年,即蒙哥征宋、蒙古军与江西接触之时,迄于1365年赣州降附朱元璋,历时107年,而以元朝统治江西的84年(1276—1359年)为重点。根据元朝史的分期和江西的历史进程,本卷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前期是忽必烈统治时期(1276—1295年),往前兼及宋元对江西的争夺,中期是成宗至宁宗时期(1295—1332年),后期是顺帝统治时期(1333—1359年),后及陈友谅和朱元璋在江西的争夺。在此期间,江西地区先是经历了世祖时期近20年的社会动荡与衰敝,到世祖、成宗之交,社会恢复安定。此后,除延祐二年(1315年)爆发的宁都蔡五九起事影响较大外,江西百姓基本能够安居乐业,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在故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顺帝继位后,江西成为江南较早出现骚动的地区。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红巾军的大规模起事后,江西很快卷入其中。所以,元代江西社会的稳定期只有50余年。

元朝对江南的统治政策基本定型于世祖时期。对于这片远离元廷中心而显得陌生的新占领区,雄才大略的忽必烈以安抚为基本方略,由此宣布免除故宋繁冗科差,蠲免公私逋欠,对江南人士亦未予歧视,用人惟贤^①,利用他们安定新附之区。但是,远不如忽必烈度量宏远的其他权贵所秉持的征服者心态、当时迫切的财赋需求以及吏治腐败的顽疾使忽必烈务求安抚的初衷难以实现。于是,元朝的江南统治政策出现了许多既不同于故宋,亦有别于中原汉地的特征。由此产生的影响,部分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消散,有些则延续数百年。

^① 参阅姚从吾《忽必烈平宋以后的南人问题》,载《姚从吾先生全集(七)·辽金元史论文(下)》,台湾正中书局1982年版,第1—82页。

其一,在依据民族和被征服地区的先后而形成的“四等人制”中,江南百姓位列第四,由此导致终元之世,江南民众在政治机遇、法律地位和其他权利方面均难与蒙古、色目和汉人比肩,尤其是作为江南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在元代没有得到有效的笼络。与宋代相对开放的官僚体制相比,这种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疏离,难以较为广泛地参与到现实政治来,元代江南的社会支撑力量相应地显得薄弱,于是,元末社会大变动之际,江南地区尽管出现了一些抗击义军的死节之士,但总体而言,起而护卫王朝生存的力量显得较为涣散、单薄。同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样的反元民族诉求便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随着元朝的灭亡,此种诉求变为现实,加之朱元璋大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八十多年生活在“四等人制”下的江南民众的心理阴影随之烟散。

其二,政治上位处末列的江南又是元朝辖境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元军攻宋,以招抚为主,江南基本未受残破;入元之初,为实现社会的顺利过渡并保证尽快从江南获取财赋,元朝总体上较为平稳地沿用故宋的夏秋两税制,加上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的推行,江南经济保持了原有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人口优势进一步加强,其赋税支撑了元朝财政的大半壁江山。每当元朝财政陷入窘境、需要增拓财源时,江南总是首当其冲。从世祖时期的理算钱粮、括勘田土,仁宗时期的经理田亩,到元末兵戈纷扰中仍想尽办法运输漕粮北上,无不反映出元朝财政对江南的倚重。因此,承南宋而来的江南经济优势在元代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元朝在江南推行的诸色户计制度加强了对民众的人身控制,使其由国家的编户变成子孙世袭的差役户。这是对此前百姓职业和身份可自由流动趋势的逆转。这一变化为明代所继承,其影响不仅止于经济、社会层面,还上及政治,成为明代专制的社会基础^①。

其三,元朝的“国族”蒙古人在数量上远少于臣服的汉人和南人,其镇戍体制也不像唐、宋等汉族王朝那样,集精兵于政治中心及其周围,“强干弱枝”即可保障统治的稳定。相反,统治地域的广大、民族成分的复杂等客观因素决定了它不仅要最精锐和他们认为最可靠的怯薛和侍卫亲军用于护卫宫城、后妃宫帐及两都(大都和上都)地区,还必须防止诸如草原地带东西两面的乃颜、海都之乱、北方山东的李璘之乱以及江南地区此伏彼起的反元斗争。于是,元

^① 萧启庆:《蒙元统治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的省思》,载蒙藏委员会、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第二届中国边疆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蒙藏委员会1996年版,第1—16页。此文又收于萧著《元朝史新论》,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61—82页。